沂源猿人化石的发现

倪 元 文

1982 年 5 月 5 日,新华社发布了一条轰动史学界的电讯 不久前，在沂源县骑子鞍山发现了距今 40 万年至 50 万年的猿人化石。沂源发现了猿人化石的消息，迅速传遍了祖国的四面八方，从此，沉睡了几十万年的沂源猿人洗掉它面上的历史尘埃，沐浴着 80 年代的阳光,与世人见面了。

1966 年 2 月出版的《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66 年 2 月第十期第一卷)白云哲、戴尔俭两人发表的‘山东旧石器遗址’(即土门镇千人洞)及《考古工作卅年》、《中国历史地图集》等材料上都记述着沂源县有旧石器遗址，但始终未发现古人类遗存，上级业务部门曾多次提醒要特别注意。1981 年沂源县文物部门在文物普查时确立三处重点，一是涨河上游的三岔区丝窝；二是汶河发源地黄庄区青杨崮段鲁山周围 三是沂河上游土门镇千人洞一带,这三个点都于 1980 年普查一遍。因第三重点区是部队驻地未及细查，1981 年确定再查,9 月 16 日,张文明、杨雷、徐淑彬三人,根据修路的孟坡村徐习贵和五〇四部队指战员提供的线索，发现了在柏坪山北头的化石群以及骑子鞍山东山根下崖洞南 60 米处化石点,天色已晚,17 日,杨、徐二人再探,收集到许多碎骨片,18 日,杨、徐、柴向荣三人又进行发掘，结果在该处地下 20 厘米处，发现了头盖骨化石以及其他动物骨骼、牙齿化石,但由于知识缺乏,不敢断定。于是找县医院外科大夫贺师贤及镶牙馆人员识别，并多次向地区文化局汇报,最后在县、地文化局的支持下,于 10 月 4 日电告省文化局。10 月 6 日省里派袁明、吴文祺二人来县看了标本,并去实地考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察，10 月 9 日决定由张文明、徐淑彬随同去省汇报。省文化局极为重视，省博物馆孟振亚同志作了初步鉴定，决定由吴文祺偕同张、徐二人于 10月 14 日去北京，向国家文物局汇报。经吴九龙介绍，找到北京大学历史系专攻旧石器考古的吕遵谔教授，经吕教授仔细询问，反复验证，最后确认：

1、头骨石化程度很好，系更新世中期猿人头骨化石，距今约 60 至 20 万年，同期或稍晚于北京猿人。

2、肿骨鹿下颌骨确凿无疑，该动物 20 万年前已经绝迹，其他牙齿有班鹿、鬣狗、披毛犀、洞熊、野马等动物，均石化很好。

10 月 27 日，吕教授偕同其研究生黄蕴平及省考古所吴文祺同志来到沂源县，在县招待所三号楼西会议室召开命名会。参加会议的有副县长宋奎元、宣传部长冯学训、副部长冯洪吉、文化局长王常珠，及图书馆的徐信梅、张文明、杨雷、徐淑彬等，会议命名头骨化石为“沂源猿人”或“沂源人”。与会人员还查看了“沂源猿人”的出土地点和自然环境、地质、地貌、岩层情况，看了上崖洞、千人洞、石龙洞、大泉洞两处化石群地点、四个区及六处土质情况，又看了图书馆收藏的古生物化石，最后认定：沂源古生物化石非常丰富，还有可能在别处发现古人类遗物。

11 月 11 日，吕教授与省、地文化局领导二次来我县，具体指导了发掘工作。通过这次发掘，共获得：一块头盖骨、六颗牙齿、一块肱骨、一块肋骨、两块眉骨。经鉴定，头盖骨包括有大部分顶骨、部分枕骨和额骨；六颗牙齿分别为左上侧门齿两颗，左、右上第一前臼齿和左上第二前臼齿各一颗，右上第二臼齿一颗。专家们从化石的颜色、牙齿的磨损程度和不同的出土地点来判断，认为这些标本可能是两个成年猿人遗存的骨骼，眉骨的粗壮程度与牙齿的原始性质皆与北京猿人相似。同时在这里发现的共生哺乳动物化石有肿骨鹿、李氏野猪、梅氏犀牛、马、洞熊、鬣狗、虎、巨河狸等十几种。

1982 年 5 月 21 日,在省文物局统一领导下,省、县考古工作者及北大考古系部分师生,在吕教授指导下,在猿人化石出土的第三地点又发现了猿人牙齿两颗,专家初步观察认为,一颗为猿人的右下第一或第二臼齿,从地层层位、石化程度和化石颜色上看,与首次发现的猿人牙齿一致,有可能属于同一个体。在共生的哺乳动物方面,还发现了一颗猕猴的牙齿。

“沂源猿人”化石的发现,是我国古人类考古工作上的又一重大发现,在我省是首次,在全国按古人类进化年代当属第五位,按其分布当属第九位。“沂源猿人”的发现有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不仅填补了我国猿人地理分布的空白,而且对于了解北京猿人、安徽和县猿人及东北古人类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对于研究第四纪(200 万年前以来)哺乳动物群的分布和古地理、古气候也有着重要意义,尤其对于研究揭示古人类的发展进化提供了可靠的佐证。

后李遗址发掘侧记

王 永 波

后李遗址地处泰沂山系北侧山前冲积扇的前缘，位于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齐陵镇后李官庄村西北约 500 米处淄河东岸的二级台地上。西南距临淄区治辛店约 12 公里，西北距临淄齐国故城约 2.5 公里。淄河由南向北经由遗址西南侧。由于河水的冲刷，遗址的西南部形成了高达十余米的断崖，现存面积十五余万平方米，济青高速公路东西从遗址中间穿过。10 前，笔者作为后李考古工地的领队，与几十位同仁一道，经过两年多的艰苦努力，圆满地完成了临淄后李遗址的发掘任务，为山东地区最早的考古学文化—后李文化的确立奠定了基础。闻名中外的春秋大型车马坑涵洞横卧于公路之下，作为其保护展示设施的临淄中国古车博物馆则坐落在公路的南侧，给来往车辆川流不息的高速公路平添了一幅诱人的画卷。

时间老人已悄悄地送走了 10 个春秋，本人也因工作需要，分别于 1990 年和 1997 年秋天两次被调离考古所，但今天回顾这一过程仍然是记忆犹新，感慨系之。

一、为安营，孤军深入官庄村

1988 年春，为配合济青高速公路建设工程，山东省文化厅成立了济青高速公路文物工作队。当时山东省考古所及有关市、县的考古工作者在济青路全线 300 多公里的范围内展开了全面的考古勘探、发掘。任务较重的有两处，其一即为后李遗址，文化层堆积厚约 2～5 米，计划发掘面积 7000 平方米；其二为章丘宁家埠遗址，

文化堆积厚约 0.5～1 米,计划发掘面积 6000 平方米。为了应付艰巨的发掘任务,考古所决定培训一批技术工人。从各地农村招收了 200 余名中学毕业生，集中了考古所绝大部分的业务力量和后勤人员，在宁家埠工地进行实地培训。

4 月下旬，受省考古所派遣，我和王守功同志到后李官庄做前期准备工作，进村碰到的第一个难题是住房问题。根据发掘规模和工期要求，最低限度要有 20 间左右的房屋。但后李官庄仅是一个百余户人家的贫困小村，少量的闲置房屋根本无法满足考古队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把目光转向了村头一处大杂院。

那里是废弃多年的大队部和村小学旧地，断壁残垣，满目疮痍：院墙已全部被村民作为建筑材料拆走，只留下断断续续的墙基 院内布满了草垛、粪堆和垃圾,成了鸡鸭猫狗、甚至是鼠鼬的乐园 ;一排 18 间破旧不堪的草房,由于年久失修,房顶多处塌陷,土坯墙壁多处透亮漏风,门窗残缺不全,屋内则粪便、砖头、瓦块无所不有。经与村党支部和村委会协商、并征得考古所领导的同意,我们决定对这排危房进行必要的修缮，以为考古队的驻地。

目标一经确定,我们便开始了紧张的备料工作,每天骑着自行车，到十几里乃至几十里的村镇购买建筑材料，走村串户收购麦秸。白天四处奔波，晚上到离村十余里的齐都镇住宿。

材料备齐后,就该组织人马动工了。这时王守功同志也被抽调到宁家埠工地，我只好独自带着简易铁床和行李，进驻到后李官庄那个大杂院，在一处大通屋较安全的角落里安下了铺位，开始了“ 自炊自擂 ”式的‘ 孤家寡人 ”生活,并着手进行场地清理。

场地清理的最大难点是搬迁大院中的草垛和粪堆。白天村民忙着营生，我便利用晚上的时间和村党支部书记一起走家串户进行说服动员，终于征得了村民的理解和支持。我们在村里征召了几位民工，协助村民搬迁、清理垃圾。在经受了将近一个星期的灰尘沐浴和烟火洗礼之后,大杂院的地面总算是‘ 重见天日 ”;有了初步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的模样。全面的整治修缮工作也随之展开。

第二个难题是用水的问题。由于临淄三十万吨乙烯工程的建成投产和连年的干旱，淄河常年无水，地下水位也降到 40 米以下，整个村庄仅靠村头一口新打的深水井和一个小水塔分早晚两次供水，每次供水时担水的村民都在水塔前排队等候。以考古队的规模及清洗陶片等用水的总量，要加入村民的担水行列，不仅难以满足需要，更有和群众争水之嫌，弄不好会严重影响群众关系。为了解决这一矛盾，我们决定利用院内一口废弃的沼气室。

土法沼气的发生，是用庄稼秸秆和人畜的排泄物作为基本原料，用沼气室作为生活用水的盛储器，其矛盾是可想而知的，好在离考古队正式进驻还有一段时间，让我们有机会进行消毒、处理。我们将沼气室内的垃圾、脏物掏净，用水泥将投料口和进料口的底部封死、堵漏，再放水浸泡、消毒。经过这样的反复处理，一口装满后可用三五天的“水井”就算建成了。然后从机井引一条地下水管，与村里约定供水方式。在日后两年多的时间内，这口由沼气室改建而成的“水井”，不仅有效地满足了考古队的用水，并在断电停水、修房建屋和抗旱保种时为群众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对考古队和村民融洽相处作出特殊的贡献。

工地的前期准备工作在村党支部、村委会和群众积极、善意的支持配合下，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努力终于有了结果，18 间危房“焕然一新”，新增建的厨房、“水井”、临时“库房”、茅厕等各安其位，大院也重新拉起了围墙，安上了铁门。考古队的营房终于“骄傲地矗立”在后李官庄的村头。由于工料比较便宜和精打细算，修缮费用总开支尚不足 4000 元，这在当时也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二、迎考验，厉兵秣马初战捷

雨季过后，后李考古队于 8 月下旬正式进驻工地，这时考古队的“编制”已增至 30 人左右，包括 20 余名刚刚在宁家埠工地受过

一个多月简单训练的、还不能算是技工的技工和王守功、李振光、倪国胜、刘延常等 4 名专业干部，干部中又有 3 人是刚出校门的大学毕业生。以这样的‘乌合之众’来应付规模如此之大的发掘任务，无异于赶鸭子上树，其难度是显而易见的。但是面对公路全线专业人员的紧张状况，我们又不得不勉为其难，硬着头皮上。这对考古队和我本人都是富有刺激的挑战和极为严峻的考验。

正在我苦无良策之时，公路建设部门在征地问题上的延误给我们赢得了练兵的时间，我们便利用这段空闲时间采用课堂讲授、野外模拟操作、标本观摩、现场作图、书面答题等方法，对技工进行基础理论、发掘常识、土质辨认、陶片识别、田野绘图等全方位的再培训，并在附近地区作了一些考古调查，使干部的实际工作能力和技工的基本知识都有了明显的提高。

10 月下旬，工地总算可以开工了。由于是配合工程，发掘区被限定在公路占压段长约 200 米、宽约 50 米的狭长地带。为了尽快提高技工的业务素质，我们把这次发掘作为大战前的预演练，在遗址的西部断崖上开了 19 个 5×5(米) 的探方，每个探方配备两名技工或一名干部加一名技工，把发掘区划分为四个小区，让四名干部分片把关，对邻近探方的技工进行辅导。每天除根据发掘中发现的实际问题进行现场讲解训导外，在征得全体技工同意的前提下，坚持在 8 小时的法定工作时间之外，不计报酬(在正常情况下，加班就应加薪) 地于晚上加上两小时的室内课，就一天中出现的各种现象、问题作集中讲解。到 12 月底此次发掘结束时，除个别不肯用心或素质较差的技工，整个队伍的基本素质已提高到可以承担一定发掘任务的程度。

临淄地区，特别是齐国故城作为国家和山东考古工作的重点，自五十年代以来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几乎没有间断。但其调查和发掘的古文化遗存基本集中在两周时期，对史前遗址只进行了一般性的调查和极少量的试掘。后李遗址就是由当时的山东省文化

局临淄文物工作队在文物调查过程中于 1965 年发现的,同年秋天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在遗址的西南部作过一次试掘，发现了被称为‘ 大汶口文化 ’和‘ 晚商 ’时期的遗存。

这次发掘的主要收获在于基本上弄清了遗址的堆积状况，确认后李遗址的主要堆积为两周时期和前大汶口时期的遗存。更为重要的是，在属于北辛文化时期的堆积下面发现了一种文化面貌独特、文化性质尚不明确的文化堆积。由于晚期遗存的破坏,这种堆积在发掘区内保留得极少，出土物极为贫乏，面貌亦不甚了了，但其陶质疏松、器类单调、不见泥质陶和三足器的特色,却预示着一种前所未见的早期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将在这里‘ 诞生 ’。这一发现给我们以莫大的激励，对今后的发掘工作指示了明确的方向。

三、赶工期,傲雪凌霜斗酷暑

首战告捷,虽然振奋人心,完成任务的前景却并不乐观。按照合同工期,1990 年夏季到来时,我们必须撤出发掘现场。公路部门的征地延误，使我们白白丧失了一个半发掘季 （1988 年春季和半个秋季)的宝贵时间。两个发掘季过去了,完成的发掘面积尚不足合同要求的 7%，在以后的三个发掘季中如何完成 93% 的发掘任务,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首要问题。为此,考古队向所领导提出了突破遗址发掘的季节禁忌(雨季和封冻期不宜进行遗址发掘),尽可能地延长每个发掘季的工作时间,抽调人手,加强力量,扩大开方面积的建议。所领导认为，以后李考古队当时的人员技术构成情况,尚不具备扩大开方面积的条件 但发掘时间可视气候情况尽可能延长。根据这一原则,我们自第二次发掘开始,把每个发掘季的时间延长到 4 个月以上 。

第二次发掘自 1989 年 2 月开始,6 月中旬结束，虽然人员没有增加,但由于有了第一次发掘的经验,发掘进度明显加快,发掘

时间向冬季和夏季扩展，也使我们能够做完两批探方。共完成 5×5(米)探方 43 个，发掘面积比第一次增加了 1.3 倍。

第三次发掘开始时,合同工期已过去将近三分之二,完成发掘面积仅占 22%，尚不到总工作量的四分之一。要在三分之一多一点的时间里完成四分之三的工作量，没有切实得力的措施是不可能的,所里也明确要求加快进度,最低完成 2500 平方米的发掘面积,同时把技工增加到 50 余人。经过两个发掘季的锻练,考古队也初步具备了大规模开方的条件。此次发掘分两批，共开方 100 余个，加上每个探方配备的两名民工，工地的总人数超过了 200 人。当第一批探方尚未结束,第二批探方已全部开工时,整个发掘工区共有 100 多个整齐有序的、正在施工中的探方，其场面蔚为壮观，令人振奋。此次发掘自 1989 年 8 月下旬开始到 12 月底结束。

第四次发掘是后李工地的最后一个发掘季,按照合同要求,还应该完成 3000 平方米的发掘面积，从学术的角度说也应该尽量多挖一点，以解决前三次发掘所提出的学术问题。但是由于调离、辞退和自然流失，技工已不足 40 人，刘延常同志在第一次发掘结束后即被调离，倪国胜同志也只参加了前两次发掘，只剩下 3 名干部,要完成 3000 平方米的发掘面积已不容乐观。更为严峻的是,随着工作的进展，新发现了钻探资料中完全没有标示的 2 座大墓、2 座春秋车马坑、近 200 余座小墓和 30 余口深达 10～15 米的水井。对于这些意外发现,如果仅从学术角度考虑,无异是求之不得的好事,但对于合同的履行却增加了极大的难度。考虑到公路建设部门曾因征地问题耽误了部分工期和考古发掘某种程度的不可预见性,遂向建设部门提出减少发掘面积和延长工期的要求。经协商得到认同。所里也先后派张振国、靳桂云、张启龙等同志参加了这次发掘。本次发掘于 1990 年 2 月中旬开始,共开 5×5(米)探方 100 余个,清理中大型墓 2 座和 1 座春秋大型车马坑。除车马坑的清理保护工作延长到 9 月中旬外，大部分探方的发掘工作均于 6 月底

结束，基本完成了预定发掘任务，保证了公路建设的顺利进行。

冰冻与寒冷、酷热和淹方是冬夏两季遗址发掘难以回避的考验，而干旱和土地干裂则是山东地区春秋两季考古发掘中最常见的困难，需要因时因地采取灵活的方法加以解决。

后李遗址为淄河东岸的高台地,西、南两面是宽达三四百米的淄河河床,东、北两面是广阔的田野,在每年初冬和早春时节,凛冽的寒风掠过毫无遮拦的岗地,尘土夹杂着沙粒,无情地撕裂着考古工作者裸露的面颊,透过略显单薄的衣着(太厚无法下蹲),刺扎着他们的肌肤。对于常年在农村劳作的农民来说，这或许算不了什么!但对于刚出校门的大学生、对于常年在有暖气的室内工作的学者而言，则需要不怕吃苦的勇气和坚韧不拔的精神。 更为严重的是,有时直到上午 10 时许,探方工作面厚达 4～5 厘米的冻土尚无解冻的迹象,田野考古规则又不允许将这层冻土去掉,只好用柴火烘烤,当地面解冻时,又是满地泥泞,长时间无法工作。一天下来,人们虽然是满脸青紫,浑身泥土,间或双手还裂着血口,然而工程的进展却缓慢得更让人无法忍受。为了提高工作效率,我们采取了中午不休息的作息制度和晚上下班时加盖浮土防冻的方法，才使被动的局面有所改观。

酷暑对于生活在山东中部城市的人们来说，感受是相当深刻的 当夏季来临时,空气的炙热,使室内的桌椅、沙发等都变得烫手，电扇吹出的风也会使人感到阵阵莫名的焦躁。同一时刻里坚持在工地上的考古工作者所面对的则是当空的烈日、灼热的地面和探方内让人窒息的闷热。他们没有伞,更没有电扇和空调,用来消暑的只有几桶开水和一顶旅行帽。尽管采取了早上工晚下工、避开中午最炎热时间的作息制度,但上午 9～10 时和下午 3～4 时的时间仍然是难以忍受的,即使是当地的农民在这个时间里,通常也是不出工的。更为困难的是，刚刚刮出的平面未等看出眉目就被炙热的太阳烤干了，有时为了同一个层面往往需要经历几次乃至十

次洒水、刮平的反复，使通常一次即可完成的工作量陡然增加数倍。后李遗址的主要堆积为亚粘土和粘土层，每当干旱时节，地面板结，镐头下去只能凿下一小块土疙瘩，难以作业。解决的办法就是向地面洒水，从发掘区到考古队驻地有将近 1 公里的路程，用小推车一次只能推两桶水，虽然无法满足工地的需要，但在头两个发掘季中却是我们对付旱魔的惟一手段。第三次发掘时，村里在发掘区附近的农田里打了一口机井，为我们加快工程进度提供了十分便利的条件。为了充分利用机井的水源，我们在探方去掉表土后，整齐四壁之前，对探方连续两次灌水，使待发掘地层基本达到完全湿润，并在工地上修建了一个储水近 10 立方米的临时水池，以备机井停机和发掘工作面被太阳烘干时使用。这一措施为后两个发掘季的工程进度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四、勤敬业，衣带渐宽终不悔

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田野考古发掘实行领队负责制，除业务方面的指导把关外，工地上一切与管理有关的事宜，包括与各有关单位如省、市、(县)区公路建设部门、公安局派出所、当地文物部门及当地群众的关系协调，文物安全、人身安全、备品购置、管理乃至衣食住行等等都要领队负责，俨然如一个正式单位的负责人。

对于由三四人乃至十几人组成的发掘工地来说，一名领队是可以应付的，对于规模较大的工地，干部的配备则必须有所调整。如前述宁家埠工地的领队为当时所长张学海先生，专业干部总计达 30 余名，其中具有领队资格或领队经验的就有六七名；在后勤保障人员不下十余名，而发掘任务更重一些的后李工地却只安排了我这样一个当时还只能算是‘大孩子头’的领队，其余队员，包括四名干部都属于‘嘴上无毛’的小青年。技工大多是贫困地区未考上大学的中学生，有着十分鲜明的个性，最大优点在于坦诚、朴实、不怕脏、吃苦耐劳；另一方面则表现为散漫、马虎、不守纪律、集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观念淡漠、缺乏应有的敬业精神等等。面对一个如此庞大的发掘现场,这样的安排很是有些“强人所难”,从另外的角度考虑,则是考古所领导对我们的信任。为了保证发掘任务的顺利完成,除加强思想、业务培训外,在日常管理工作中也有针对性地采取了一些相应的措施。

在组织管理上,我们把全部技工分为四个小队,挑选一名业务较好、责任心较强的任小队长,并由干部分别负责督促检查。制定了一系列的行为规范和奖惩制度,实行严格的群众纪律和作息时间管理,规定秋冬日晚 8 时、春夏日晚 10 时大门按时上锁,所有人员必须回到院内,由值日干部按时督察。要求干部、技工一律不准在当地谈恋爱,这与《婚姻法》恋爱自由的原则似乎有些矛盾,但鉴于以往的经验,不得不作如是之规定。

尽管我们采取了这些措施,问题还是防不胜防,不时有家庭主妇为了一个萝卜或一点小事找上门来,弄得我们很是尴尬。有些事情在今天或可作为酒后茶余的笑料,但在当时却有让人“吃不了兜着走”的感觉。如邻村一位作风不甚检点的少女曾在工地工作了一段时间,影响了某些技工,我们得到消息立即将她辞退,但这位小姐还不时地找机会与技工们接触,这又引起了社会上与她有关联的一些不良青年的猜忌,他们以考古队几个技工早上常在院内练拳为寻衅借口,要与技工比武。得到报告后,我严嘱技工不得与其接触,不得单独外出,并将有牵连的技工调换到其他工地,但事情并没有结束,1989 年秋天的一个晚上,我正在寝室内看书,隔壁电视机大屋突然传出了噪杂的吵闹声。技工告诉我“快打起来了。过去一看,七八个当地青年正在寻衅闹事,局势一触即发。为稳住阵脚,我当即拉开大灯,喝令技工拿起马扎,谁敢妄动就一齐向他招呼,趁寻衅者尚在发蒙时,我紧紧盯住了为首的家伙,告诉他想打架请到外面来,随即转身出屋。这时考古队全体人员都闻讯围拢了过来,双方人数之比大约是 8∶1,动手他们必吃大亏,认输却又不

甘心，只在那里与技工们徒逞口舌之利。为彻底折服他们以杜后患,我又说,打群架你们心里必定不服,咱们一对一的比划,先过了我这一关再说。他们知道我是这里的‘头儿”,真动起手来决难讨到好处，以经验而论，区区七八个人竟敢到考古队驻地寻衅，必然认定我不敢公开下令与他们斗殴，因此一上来我就以佯装集体动武的强硬姿态，令他们气馁。其实我心里也在嘀咕，生怕这些家伙不知死活地蛮干，看他们迟疑的表情，心知此计奏效，便请其到屋里喝茶,迫于情势,他们不得不乖乖就范,离开时竟拍着胸脯保证,以后决不会有人再来捣乱。一场危机就这么戏剧性地化解了。

其他由日常生活琐事引发的纠纷，如村民强行在大院内堆放建筑用砖，在发掘区仅有 1 米宽的探方隔梁上开渠放水不听劝阻等等，均需要我们付出极大的耐心和精力。

业务上作为发掘力量主体的技工，在进入工地之初根本无法适应后李遗址复杂的地层堆积，而干部的实际工作经验也还不够丰富，面对复杂的叠压打破关系很是有些自顾不暇。故技工探方的地层区分、遗迹叠压打破关系分析、出土遗物的采集、登记编号、方位测定、现场绘图、记录要点等等，都需要我手把手地进行教导和修正。另外这项工程结束后，技工中的多数人将失去这份工作，作为临时工，很难要求他们有多少事业心和责任感。为保证探方发掘记录的科学性，我们对工地总发掘日志的记录方法作了大胆的修正：将总发掘日志分为进度日记、遗迹编号和分探方主页三个部分，前两项涵盖了传统发掘日志的全部功能，探方主页为新增项目,按时代分设 3～4 个层面坑位图，详细记录每个探方的发掘情况，以便与各探方的发掘记录相对照，这一方法对有工期时限要求的大规模发掘工地具有普遍的推广意义。为腾出更多的时间，集中精力做好技术辅导和业务把关等方面的工作，自第二次发掘开始时，我决定由王守功同志辅助领队工作，分担诸如施工监督、安全检查、发掘日志记录、遗迹编号、人员调配和对外联络协调等工作。

尽管如此,每天巡回检查 20 几个乃至 50 余个探方,在距地表深达 1～2 米,甚至 10～15 米(水井的探度)的工作面上反复出入,还要不停地帮助他们刮地层，分析纠正错误，工地收工后，还要处理一大堆各种各样的杂事，一天下来实在有些吃不消。在车马坑清理期间我们又经受了一次非常人所能忍受的严峻考验。

1990 年 5 月中旬，发掘工作按期已进入扫尾阶段，最后一批探方的底部却发现了大面积的夯土，经探测确认为一座长 30 余米、宽约 4 米、深度达 1.7 米的大型车马坑。

车马坑的清理是田野考古工作中一项难度极大的工作，由于年代久远,木质的马车已完全腐烂,只在坚实夯土中留下一些较疏松的痕迹,稍一疏忽,便可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害。若经雨水冲刷则将荡然无存,因此必须在雨季到来之前基本完成清理工作,而当时的气象预报又称 6 月上旬即有大雨。工期迫近，雨季将临，我们又缺乏清理此类遗迹的经验,所里也无适当人选支援,真可谓十万火急。为了赶在大雨到来之前，为了尽可能地保证遗迹现象的完整，经反复研究,我们对清理人员作了细致专门化的分工,不同部位分别由不同的专人负责，并从结构略为清楚的 2 号车入手,以取得了经验,极大加快了工作进度,于 6 月 5 日基本完成土方和轮廓清理,搭起了防雨塑料大棚,清理工作转入诸如漆皮和车舆等细部结构剥离的细致入微阶段。

当时户外温度已高达 30～35℃ ,在烈日烘烤之下塑料暖棚内的温度就可想而知了。由于没有通风设备,坑内空气闷热难当,给人一种窒息、晕倒的感觉。为应付这严酷的环境,我们挑选了十余名身体结实、业务较好、敢于吃苦的技工与干部一道坚持棚内作业。人毕竟不是铁打的,作为工地负责人我必须为同志们的健康和安全负责。为此,我们将人员分为两批,每 10 分钟轮换一次,进入棚内作业时人们恨不得把身上的衣服全部脱光，甚至连青年女工也顾不得矜持。尽管如此,有的同志在 10 分钟的时间内还要到棚

口换换气才能坚持下来。当空烈日给我们以火的考验,滂沱大雨则使我们面临着“灭顶之灾”,1990 年夏季的气候似乎也有意与我们为难:6 月 13～14 日,较常年提前到来大雨,使干枯多年的淄河头一次有了溪流,深陷地下的车马坑正是雨水的好去处,我们的塑料大棚也抵挡不住阵阵大雨的攻击,刚刚出土的珍贵文物随时都有被毁掉的可能。四面楚歌的考古队员全体动员,在没有雨具、没有排水机械的情况下排成长龙,用铁锹、水桶、脸盆、饭勺同天公展开一场没有胜算的肉搏战。天渐渐黑了下来,雨还没有停的意思,车马坑中的积水越来越深,大家顾不得吃饭,顶着阵阵疲劳的侵袭顽强地搏斗着,闻讯赶来助战的临淄区副区长、文化局副局长等人也加入了战斗行列。晚 9 时许,借调的抽水机终于送达现场,险情才逐步有所缓解,不知是考古队员的顽强精神感动了上帝,还是雷公被机器的轰鸣声吓破了胆,大雨终于渐渐停了下来。回到驻地已是凌晨 1 点。以后的几场大雨也毫不例外被考古队员的顽强和英勇挫败。

紧张繁忙的工作和过大的体力消耗,对我个人的身体也造成了严重损害,从 1989 年下半年就时常感到前胸不适,到 1990 年春天有时连续几天出现剧烈的阵痛,趁回单位汇报工作的机会到医院检查,诊断为心脏病,大夫嘱我住院观察。工地发掘工作正处于紧张阶段,同志们都在顽强地工作,我只得谢绝大夫的好意,次日便与到工地检查工作的佟佩华副所长一起返回了工地。发掘结束后,经过 3 年多的诊治,症状才基本得到控制。

在车马坑清理保护 3 个多月的时间里,同志们的体重下降了许多,付出的汗水却远远超过了自身的体重,而这一切都是在没有任何特别补偿的情况下完成的,我们的考古队员仍然无怨无悔地坚持着。我为同仁们的吃苦耐劳、无私奉献感到骄傲,感到自豪。

后李遗址的发掘,使海岱地区早期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目前这一课题已被列为考古学界国家

哲学社会科学“九五”期间三个重点项目之一 后李西周早期齐墓的成批出土,在考古史上还是第一次,为齐地考古学物质文化的分期、编年标尺的建立和周初夷夏交争、民族融合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而春秋大型车马坑的完整出土，在山东地区尚属首次,在全国也是十分罕见的,这一成果被评为 1990 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为源远流长的中华上古文物宝库增添了一颗灿烂夺目的明珠。

北辛遗址发掘亲历记

万 树 瀛

1964 年春天，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一支文物普查队来到了滕县,我奉命配合他们工作,在历时三个半月的田野调查中,我们跋山涉水、风餐露宿,在全县 31 个乡镇沿着自北向南的 5 条河流踏遍了两岸的村庄和河边的沟沟坎坎，共发现了 86 处古文化遗址,数以百计的石刻、碑碣、古建等不可移动的文物保护项目,还收集到 300 多件各类文物，为我县以后文物工作的开展创造了条件，我也从此踏上了文物考古工作的历程。

北辛遗址是这次普查中的重要发现之一，遗址坐落在距县城东南约 30 公里的薛河岸边，地居鲁中南丘陵与鲁西平原的结合部,面积约 5 万平方米，分别居于河流两岸隆起的土岗上，由于遗址的南边紧挨着北辛村，故而得名。最初，我们在地表上捡到一种带有细泥条堆筑纹的褐色陶片，觉得很新鲜，后来相继在河边断崖上发现了大汶口文化的灰坑，打破这类陶片出土的文化层，因而认定它是一种更早的文化遗存。可惜不久之后，一场众所周知的风暴，席卷了中国大地，考古事业也与其他事业一样被迫停顿。直至 1978 年的秋天，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队与滕县博物馆联合组建了北辛遗址考古发掘队，才对这处遗址进行了第一次发掘，次年春天又进行了第二次发掘，两次共揭露遗址面积 2218 平方米,其中地层堆放较好的 250 平方米，获得了十分丰硕的成果。

在整个发掘过程中,清理了一批灰坑、窖穴、瓮棺葬以及与居住有关的遗迹，经整理、修复获得完整陶器 200 余件,骨角器、蚌器、石器等 1000 余件，粗略考虑一下有以下几点认识。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